

从生命感受出发： 论穆旦晚年诗歌中的“智慧”与“荒原”¹

杨慧莹

摘要：穆旦晚年诗歌从生命感受出发，直面“智慧”与“荒原”，从“智慧”与“荒原”的意象中可解读穆旦晚年诗歌的生命之意。文中以穆旦晚年诗歌（1975年-1976年）为基础，以其早、中期诗歌作参照，跳出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回归穆旦诗歌的生命感受，重点研究穆旦晚年诗歌中的“智慧”与“荒原”意象，并具体解读晚年诗歌中“智慧”与“爱情”的联系。穆旦晚年诗歌研究并非是对穆旦诗歌进行单一的阶段性划分，而是为探求生命感受对穆旦晚年诗歌的重要意义。这不但涉及穆旦诗歌中生命与情感价值的探讨，也涵盖诗歌发展与归属问题的延伸，从而探求穆旦晚年诗歌独有的艺术价值，志在为当下诗歌发展与创作提供启发之意。

关键词：穆旦；晚年诗歌；生命感受；智慧；荒原

作者：杨慧莹，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邮箱：s2020849@siswa.um.edu.my

Title: The Perspective from the Sensibility of Life: Wisdom and Wasteland of Mu Dan's Poetry in His Later Years

Abstract: Mu Dan's later poems delve into the sensitivity of life and confront the themes of wisdom and desolation. The essence of life in Mu Dan's later poetry can be discerned through the evocative imagery of wisdom and desolation. By examining Mu Dan's works from 1975-1976 and drawing comparisons with his earlier and

1 本文系“四川省第十一届硕博学术论坛”（中国四川，2023年3月30日）会议论文《从生命感受出发：论穆旦晚年诗歌中的“智慧”与“荒原”》（荣获“优秀奖”）的修改稿。

middle-period poems, this paper transcends dualistic research paradigms to delve into the life experiences that underpin Mu Dan's poetry. It specifically focuses on the themes of wisdom and desolation, offering a nuanced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wisdom and love in his later works. Rather than compartmentalizing Mu Dan's later poetry into distinct stages, this research seeks to unravel the profound impact of life experiences on his poetic expression. It delves into not only the existential and emotional depths of Mu Dan's verses but also explores their evolution and thematic continuity. This endeavor aims to uncover the unique artistic merit of Mu Dan's later poetry, providing insights and inspiration for contemporary poetic endeavors.

Keywords: Mu Dan; the sensibility of life; wisdom; wasteland

Authors: Yang Huiying, Phd candidate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 i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mail: s2020849@siswa.um.edu.my

一、引言：穆旦诗歌与穆旦研究

穆旦，原名查良铮（1918-1977），中国著名现代诗人、翻译家，在1981年被归入“九叶诗派”诗人之一，并位于“归来诗人”之列。穆旦于1935年考入中国的清华大学地质系，不久后转入外文系，开始诗歌写作。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穆旦致力保驾护航，奔赴缅甸，参与抗日战场。在1949年，穆旦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专业。年轻时的穆旦曾转益多师、博学笃行，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也颇为深厚，在扎实的创作经验的积淀下，穆旦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新的抒情”的诗歌创作理念，“丰富的痛苦”的逐渐成为了穆旦的早期诗歌风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由于中国的政治环境使穆旦无法执笔创作，他开始专注翻译事业，以笔名翻译外国小说及诗歌，以此作为表达内心情感的途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逐步明朗，步入晚年的穆旦重拾诗魂，与诗篇再续前缘，在1975年至1977年逝世前，穆旦如诗神凭附般再创佳绩，共创作诗歌近三十首。

在穆旦晚年诗歌（1975年-1976年期间创作的诗歌）的研究中，可研究的空间还有待开发。从近年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对穆旦晚年诗歌所持观点出入较大，如夏小雨的论文《普通的生活 失败的诗歌 论穆旦晚年诗》²，黄玲的论文《寒冷·通透·忧伤——穆旦晚年（1975-1976）诗歌的一种读解》³，易彬的论文《悲观的终结——一种对诗人穆旦晚年的理解》⁴等，这些论文有以较为悲观的论调分析穆旦晚年的诗歌创作；有以穆旦一生的诗歌作结，但无法突显穆旦晚年诗歌的独特价值；有将穆旦晚年诗歌作为其早、中期诗歌创作的延展，这缺乏对穆旦晚年诗歌艺术特色的探求；也有对穆旦晚年诗歌的创作水平持有怀疑态度，等等。再如王家新的论文《“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重读诗人穆旦》⁵，王光明的论文《“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⁶，戴惠的论文《诗情不因苦难而改变——论穆旦晚年诗歌创作的品格》⁷等，这些论文跳出固有的研究范围，以情感和生命的角度探索穆旦晚年诗作，为穆旦诗歌研究提供了思辨性视野。此外，也有研究成果从时代背景与创作意图出发对穆旦晚年诗歌进行解读，如易彬的论文《个人写作、时代语境与编者意愿——汇校视域下的穆旦晚年诗歌研究》⁸等。综上所述，穆旦晚年诗歌的研究范围正在不断扩展，但却无法达成一致共识，甚至有观点相悖的趋向，并且大多研究成果停留在穆旦早、中期诗歌作品中；或将穆旦晚年诗歌包含在整体诗歌研究内；或将穆旦晚年诗歌归于二

-
- 2 夏小雨：《普通的生活 失败的诗歌 论穆旦晚年诗》，《上海文化》，2013年第1期，第44-52页。
 - 3 黄玲：《寒冷·通透·忧伤——穆旦晚年（1975-1976）诗歌的一种读解》，《名作欣赏》，2009年第12期，第70-73页。
 - 4 易彬：《悲观的终结——一种对诗人穆旦晚年的理解》，《书屋》，2002年第3期，第20-25页。
 - 5 王家新：《“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重读诗人穆旦》，《文艺争鸣》，2018年第11期，第23-30页。
 - 6 王光明：《“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136-142页。
 - 7 戴惠：《诗情不因苦难而改变——论穆旦晚年诗歌创作的品格》，《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72-75页。
 - 8 易彬：《个人写作、时代语境与编者意愿——汇校视域下的穆旦晚年诗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3期，第159-179页。

元对立的积极与消极情感，这些研究无法突显穆旦晚年诗歌转型的独特诗意。总体来看，穆旦晚年诗歌研究的深度还有所欠缺。

穆旦晚年诗歌从生命感受出发，直面“智慧”与“荒原”，这与其早、中期诗歌以“丰富的痛苦”抵抗“智慧之树”的态势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可以从生命感受的角度对穆旦晚年诗歌进行深入分析，从“智慧”与“荒原”的意象中解读穆旦晚年诗歌的生命之意。需注意的是，分析穆旦晚年诗歌并非是对穆旦诗歌归属进行简单的划分，而需以穆旦晚年诗歌为基础，以早、中期诗歌作参照，对穆旦晚年诗歌中“智慧”与“荒原”意象进行解读，从而确立穆旦晚年诗歌独有的艺术价值，志在为当下诗歌发展与创作提供启发之意。

二、跳出二元对峙：从生命感受出发

在研究穆旦晚年诗歌时，需先对穆旦诗歌的归属问题进行探讨，只有在对穆旦诗歌的归属问题进行分析后，才能进一步理解生命感受对穆旦晚年诗歌的重要意义。

随着近年来对穆旦研究的增多，学者们对穆旦诗歌的文化渊源也是备加关注，而关于穆旦诗歌归属问题的争议更是屡见不鲜。例如，王佐良提出：“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⁹，对于此观点，研究者各抒己见，或已超出学术层面的价值判断，如张桃洲认为：“这一方面常常被作为穆旦诗歌获得认同、其独特性得以彰显的依据，另一方面却也被当作了穆旦诗歌遭受指责的口实，甚至这种认同或指责渐渐蜕变成了某种具有强烈价值色彩的表态。”¹⁰又如王佐良认为穆旦的“最好的品质”全然是“非中国的”¹¹，众学者也对王佐良的观点提出异议与补充，如王家新写道：“其实这里的‘非中国’是有限定的，是指非传统中国的品质，这其实正是中国现代知识份子想要通过‘凤凰涅槃’达到精

9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附录·》，收录于《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59页

10 张桃洲：《穆旦研究的集成之作——读〈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94-195页。

11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附录·》，收录于《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59页

神重生的一个结果”¹²；王光明也对此发表观点：“它与其说是非中国的，毋宁说是非古典中国的”¹³；李怡则认为：“创造才是本质，借鉴不过是心灵的一种沟通方式”¹⁴，等等。

基于以上对于穆旦诗歌归属问题的探讨，不妨先从穆旦的创作历程进行考量。穆旦年轻时曾“转益多师”，受到西方思潮影响较深，对西方与传统文化资源皆有涉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穆旦试图以“新的抒情”¹⁵来求得感性与知性的平衡，在穆旦的文章《〈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中，穆旦对艾青的诗篇〈吹号角〉给予高度评价，而对卞之琳诗作中过于倚重“智力”的写法给予微妙的批判。在处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穆旦在二者间试图保持适当的距离，如穆旦在漫谈普希金的作品《欧根·奥涅金》时，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态度是将“散文”看作现实主义的象征，把“诗歌”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穆旦具体写道：“我们不断地在两个世界的气氛中反复穿行。这既非完全‘散文’的生活，又非完全的‘诗’境，因此，我说，它在我们的感情上促成了更高一级的和谐境界。”¹⁶通过“两个世界”的“反复穿梭”，穆旦以动态的矛盾达至情感的和谐，可看出其思想理念与中国现实情景的融和，这正如易彬的评价：“一方面，强调了穆旦对于现实生活的突入，另一方面，又论及了‘反省的距离’，这两者并不矛盾，前者使得穆旦从现实生活之中获得了非常坚实的经验，后者则使得穆旦不致被现实淹没而以独特的个性。”¹⁷由此可以看出，穆旦以中国现实土壤为诗歌创作底蕴的积淀，同时又以敏捷的情思超越现实固有的局限。

12 王家新：《“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重读诗人穆旦》，选自王家新编选：《新诗“精魂”的追寻：穆旦研究新探》，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第509页。

13 王光明：《“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136-142页。

14 李怡：《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第148-157页。

15 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选自《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60页。

16 穆旦：《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25页。

17 易彬：《论穆旦诗歌艺术精神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15页。

现实生活随着时代变动而耕耘播撒，在特定时期涵盖的内涵也有所不同。李章斌认为：“穆旦悉心学习的远不止艾略特、奥登等现代主义诗人，影响穆旦的还包括惠特曼、拜伦、雪莱、布莱克等浪漫派诗人，更包括古希腊哲学、基督教思想等深远的文化源泉，然而这些同样重要的影响源却被所谓‘现代主义’论述有意无意抹除了。”¹⁸先不论穆旦直抵“两西文化”根源的论点是否精准，但李章斌提出的顾虑：过于关注“现代主义”的焦点而忽视了其他的“文化源流”，这是值得研究者谨慎深思的。进一步来说，“现代主义”掩盖的不止是文化层面的交涉，也一并隐匿了感受方式本身的诗性意义与诗歌精神。孙玉石曾对“二元对峙”的思维理路进行警醒：“我们能不能摆脱非此即彼的思想匡束，在中国的与非中国的之外，来思考新诗自身传统与传统诗艺之间的关系问题。”¹⁹孙玉石的阐述使研究者警醒穆旦研究的局限之处，诗歌的艺术价值是在不断尊重规范与超越规范的航行中实现艺术自由的珍贵之处，跳出“二元对峙”的窠臼是对穆旦诗歌价值进行合理商榷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对穆旦晚年诗歌的转型研究。穆旦晚年诗歌是从生命感受出发，超越了任何“主义”，超越了那种对“新奇”的表面追求，风格也变得更为质朴。²⁰若忽视感受层面的诗质寻求，则无法深入诗歌肌理，更无法确立穆旦晚年诗歌转型后的独属价值。

跳出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回归穆旦诗歌本身的生命感受，这是研究穆旦晚年诗歌的关键所在。即便现实土壤的积淀为穆旦晚年诗歌的转型提供了新诗传统与诗歌艺术的价值尺度，但不同的感受方式所孕育的诗歌内质并非是传统或现实的概念框架，也不是纯粹的形而上的知识体系，而是诗人在渐悟与顿悟中生成的诗才或诗意。

18 李章斌：《重审穆旦诗中“我”的现代性与永恒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3期，第134-148页。

19 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学丛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16页。

20 王家新：《“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重读诗人穆旦》，选自王家新编选：《新诗“精魂”的追寻：穆旦研究新探》，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第516页。

三、“智慧”与“荒原”：将生命感受融入“普通的生活”

在中国诗歌的不断发展与创新中，穆旦诗歌以现实土壤为根基，以情感脉络为积淀，以普通生命的完整性来抵抗“智慧”和“荒原”的侵袭，这为诗歌创作提供诗质寻求。但这份探索并非停滞在既定的历史场所，在时空的流转中可以转化为新生的契机，激励现代人在生命情感与现实土壤中寻求历史的记忆与责任，并在现代化进程中警醒“智慧”的阴霾。

自人类文明伊始，“智慧”一词被赋予了无限的褒奖，人类社会因“智慧”而进步，被赋予“智慧”的人类设立起优越的光环，当都市建立、科技发展、物质丰富之时，“智慧”的曙光依然在无休止地蔓延。如王光明认为：“自从艾略特的《荒原》出版以来，有许多诗人想像现代‘荒原’的景象，但没有人像穆旦那样以‘智慧之树’对生命的嘲弄具体见证这种‘荒原’对人类的扭曲。人们都以理性、智力、智慧、聪明为荣，只有穆旦卓然不群地发现了它们对生命、血性、激情和艺术的伤害，怀着无奈和咒诅的感情，把它想像为现代荒原上的恶之花。”²¹“智慧”熠熠生辉，现代人陷于永夜白昼，在生生不息的运作中筋疲力尽，人类工业化进程逐渐与外部自然相抵触，也与人的本真性情相对峙。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性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理性，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现代性具有不断发展、不断分裂的性质，使现代化进程的內部出现了矛盾，这便形成了现代性断裂，具体表现在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分化，以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抗等方面。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夸父逐日的标榜变为日亦逐我的戏弄，现代人在烦躁与不安中涌现着欲望的戾气，平淡与普通被驱为平庸，心灵的“荒原”在“智慧”的庇佑下呈现出虚假的繁盛，浮躁的内心使人们无法接受“普通的生活”，牵绊在“得”与“失”的伸缩中，最终没入无穷的斗争。

在穆旦早、中期诗歌中，“智慧”对自然人性的戕害已有显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现实情景，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局部抗日开始；1937年

21 王光明：《“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136-142页。

“七七事变”，全民抗日拉开序幕；1945年8月15号，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在这简单的数字陈述背后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伤痛。陈大为认为“现代主义诗人的战争诗，是诗人对现实最明显的介入，毕竟国家存在之际，任何人都无法忽视战火。”²²若从战争的角度进行探讨，陈大为是从实体的战争联系至中国的现实图景，而此时穆旦诗歌中不但充溢着时代之思与家国情怀，也饱含着对“智慧”苦果的危机意识，这可以从精神层面探索现代人与现代社会的斗争关系。例如，穆旦的早期诗歌〈自然底梦〉（1942）²³，在〈自然底梦〉中，穆旦制造了梦中神话，驻足虚与实的边界，置换现在与过去的时空，而“智慧”是忧思的苦果，因对“智慧的皈依”，“我”遗失了本心。又如在诗歌〈智慧的来临〉（1940）²⁴中，诗中描述了不断分裂的“自己”，在向“智慧”表以妥协后，痛苦地承受着生命之轻，在背弃了忠实的情感后，“自己”与“智慧”达成的契约只是一纸空谈。此外，诗歌〈春〉（1942）〈我〉（1940）〈还原作用〉（1940）中都有涉及到“智慧”对情感生命的戕害问题，但穆旦早年的诗歌作品多数处在“有”与“无”的不定与徘徊中，未能在现实与内心的矛盾下寻得解决时代症结的有效方法。

时隔三十余年，步入晚年的穆旦在葱茏的岁月里依然不忘“智慧之树”给予生命情感的戕害，但他不再以“丰富的痛苦”踟蹰岁月的隆冬，而是以“普通的生活”直面“智慧之歌”的嘲弄，这里的“普通”并非与“丰富”相对，而是与生命的“丰富”相连。穆旦晚年诗歌是从生命感受出发，超出了“得”与“失”的矛盾范畴，这是在祛除生命的浮躁后，选择直面生活的勇气。

穆旦晚年诗歌中的“荒原”的意象与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诗作存有诗性上的互通，如艾略特在《荒原》开篇诗歌〈死者的葬礼〉中写道：

22 陈大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昆明大阵观——西南联大诗歌群落的崛起与陨落》，《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2020年第2期，第1-27页。

23 穆旦：《自然底梦》，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82页。

24 穆旦：《智慧的来临》，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41页。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从死去的土地里培育出丁香，
 把记忆和欲望
 混合在一起，
 用春雨搅动迟钝的根蒂。²⁵

诗中“荒原”象征着生命的虚无，春季则与“欲望”沆瀣一气。“荒原”的意象在艾略特的笔下“实现了荒原意象由自然荒原向精神荒原的转变”²⁶，并将诗与生命铸成盟约。由于“诗人职权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²⁷，出于对“时代的贫穷”的追问，晚年的穆旦再次对扭曲的生命进行辨认：“‘这就是生活’，但违背自然的规律”²⁸（〈演出〉（1976）），如在诗歌中具体写道：

却不知背弃了多少黄金的心
 而到处只看见贖币在流通，
 它买到的不是珍贵的共鸣
 而是热烈鼓掌下的无动于衷。²⁹

从此诗中可以看出穆旦晚年诗歌对虚假的生命情感保持警惕，“情感”本应是自然而然地流露，但是“演员”为获得赞扬，将正常的行为进行伪装，“无动于衷”的冷漠取代情感的共鸣，在欲望的驱动下丢失了情感，导致“黄金的心”被背弃，这样本末倒置的现象是心灵“荒原”对生命情感的漠视。朱光潜曾说：“艺术的生

25 （英）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著，汤永宽、裘小龙译：《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79页。

26 张岩：《荒原意象与西方文学的精神流变观》，《同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100-104+112页。

27 （德）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海德格尔文集：林中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68页。

28 穆旦：《演出》，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17页。

29 穆旦：《演出》，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17-318页。

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掩盖本色。‘俗人’迷于名利，与世浮沉，心里没有‘天光云影’，就因为没有源头活水。他们的大病是生命的干枯。”³⁰在穆旦晚年诗歌中，“生命的干枯”正是由于欲望的无限扩张，如同永恒轮回，饱受着西绪福斯的诅咒：“丧失的越多，她的歌声越婉转，/ 终至‘丧失’变成了我们的幸福。”³¹（〈妖女的歌〉（1975））这是囚徒困境的复刻，也是现代性困境的缩影。进一步来说，现代人面临可能陷于“神魔之争”的困境，被欲望迷惑而无法辨认“我”的存在，惧怕失败的恐惧使“自我”不断地逡巡在荒芜的内心，在陷入“拟象”的“荒原”后，只有通过不停地搬运才能掩盖恐慌，并对真实的生活产生抵触。

由于以上的困境，穆旦晚年从对主体矛盾的关注转向对“普通的生活”的敬意，使生命的疆土不断扩张。如在穆旦晚年诗歌〈冥想2〉（1976）中写道：“我的全部努力 /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³²，穆旦从“普通的生活”中深切体验到“智慧”对生命情感的无情戕害，理性可以保护自身不受伤害，却无法治愈心灵的伤口，唯有情感可填补心灵的创痛。穆旦晚年诗歌对于“情感”与“智慧”的警醒是源于生命感受的现实生活，他直面生命的“普通”与“丰富”，内心的宁静不会被外界的困苦而扰乱，生命的价值也并非因外界的附加而改变。穆旦试图通过深思与内省的方法以保留情感，这是从内部突破的方式，在解决过程中将内外融合，让情感进入“普通的生活”。而在“荒原”里的生命往往丧失了对理想的追求，以欲望作为不断攀爬的动力，使人异化为单向度的人，技术的本质在日益侵蚀着人的本质，千篇一律的制造也在吞噬着个体的独特价值。穆旦则选择“诗意的栖息”，他高唱“真正的自我”，即便是时间的洪流也无法将普通的生命摧毁，如晚年诗歌中写道：“时间愚弄不了我，/ 我没有卖给青春，也不卖给老年，/

30 朱光潜：《谈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8页。

31 穆旦：《妖女的歌》，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09页。

32 穆旦：《冥想2》，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28页。

我只不过随时序换一换装，/ 参加这场化妆舞会的表演”³³（〈听说我老了〉（1976））。这就是穆旦倚重的生命情感，生命的外在形态即便衰老，内心的平静却无法被欲望侵蚀，在生命的舞会中展现着平凡、真实的生命形态。同时，在对“普通的生活”的感受中，生命也被赋予了情感的意义，其中“回荡着我失去的青春，/ 又富于我亲切的往事的回味”³⁴（〈友谊1〉（1976））。于是“普通的生活”中的普通人在获得了丰富的情感后，也可观察到美丽的瞬间，如孙玉石写道：“他（穆旦）的诗发现并表现出那些在生活里、在个人情感深处里本来存在却不是人人能够发现，也没有办法随时感受的美，那些极为珍贵的‘美的瞬间’。”³⁵这些“极为珍贵的美的瞬间”源于生命感受，将生命感受融入“普通的生活”可以填补心灵的“荒原”，此后，片刻的宁静便成为永恒，这是穆旦在“普通的生活”中体验的生命情感。

穆旦在三、四十年代对抗“智慧”采用的是变形分裂、向外扩张的内缩模式，即以“情感”对“理智”进行冲击，那么晚年的穆旦在经历了重重的苦难之后，对“荒原”有了更深刻的体验，这时的“荒原”更多地染上了历史思考和现实折磨的痕迹。³⁶虽然“智慧”带来的物质文明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但高速的碎片运动则将人们的心灵隔绝，而人的自然天性需要精神沟通与情感交流，若过度地痴迷外在的功利，或逡巡在自我的世界，则会脱离现实而没入虚空。当情感的光芒照亮自我与生活，当“一幕春的喜悦和刺痛，/ 消融了我内心的冰雪”³⁷（〈有别〉（1976）），人们的生命感受逐渐苏醒，普通生活被照亮，生命过程则得以突显。

33 穆旦：《听说我老了》，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25页。

34 穆旦：《友谊1》，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31页。

35 孙玉石：《走近一个永远走不尽的世界——关于穆旦诗现代性的一些思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55-59页。

36 高秀芹、徐立钱：《穆旦 苦难与忧思铸就的诗魂》，北京：文津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37 穆旦：《有别》，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35页。

四、“爱情”与“生命”：乌托邦的欺骗

从穆旦的爱情诗〈玫瑰的故事〉至〈玫瑰之歌〉，从〈华参先生的疲倦〉至〈诗八首〉〈赠别〉，再至晚年爱情诗〈妖女的歌〉与〈爱情〉等，可以看出穆旦诗歌中对“爱情”态度的转变。穆旦初写爱情诗时，以追求永恒性与古典美作为创作意图，而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转向对爱情的暂时性与危险性的探求，再到晚年诗歌中对爱情乌托邦与欺骗性的揭示，这个过程展现了穆旦对生命价值与感受方式的转变。易彬认为“隐匿”乃是穆旦爱情诗基本之所在³⁸，而穆旦晚年诗歌中的“爱情”到底“隐匿”着怎么的生命感受，这需要结合诗歌文本、个人经历、创作观点进行具体分析。

穆旦早年诗歌中的“爱情”具有短暂性与变更性，虽然此时的爱情诗具有“绝望之感”，但从诗歌中依然可以解读出“爱情”的丰富气息。如穆旦在四十年代创作的经典爱情诗组诗《诗八首》（1942）中，从诗句“那里有它底固执，我底惊喜”³⁹（〈诗八首3〉），“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⁴⁰（〈诗八首4〉）等可以看出“爱情”的矛盾性波动。但《诗八首》并非是对“爱情”的赞美与向往，“爱情”本是不断变动的，穆旦以其敏锐的目光，将“爱情”本质一语倒尽：“相同和相同融为怠慢，/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⁴¹（〈诗八首6〉）；“不断的他添来另外的你我，/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⁴²（〈诗八首2〉）”。在穆旦诗歌中，“爱情”蕴含着“丰富”及“危险”，并指向对“生”与“死”的自由选择。生存的自由选择是生命得以存在的证明，但与其说是“爱情”本身验证生命存在，不如说是人们希望通过爱情选择的

38 易彬：《被点燃、被隐匿的“青春”——从异文角度读解〈春〉及穆旦的诗歌特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138-144页。

39 穆旦：《诗八首3》，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77页。

40 穆旦：《诗八首4》，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78页。

41 穆旦：《诗八首6》，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78页。

42 穆旦：《诗八首2》，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77页。

方式显现自由的生命价值。“爱既是一种使我们结束孤独之寒冷的伟大的统一的力量，又是一种令我们陷入危险的疯狂的、毁灭的力量。”⁴³因此“丰富而且危险”也意味着“爱情”具有的两级性，即理想的“爱情”与现实的“爱情”，但当理想的“爱情”越过“大理石的理智殿堂”后，便只能“为它埋藏的生命珍惜”⁴⁴，由此可以看出《诗八首》中已然诅咒着幽禁性灵的“理智的殿堂”。⁴⁵在“丰富”与“危险”伦理抉择中，早年的穆旦试图通过外在“神性之爱”得以救赎，虽然看到现实的“爱情”没有纯粹的自由，也会终归于“程序”，但由于“爱情”可以为生命价值向外寻求提供可能性，那么穆旦早期爱情诗中依然存在对于“丰富”爱情的表述。

穆旦晚年诗歌是以生命感受的方式来审视“爱情”，“爱情”已经失去早年的“丰富”与“危险”，此时的“爱情”与上文的“智慧”内涵一样，作为“智慧”的载体，“爱情”象征着与现实社会脱离的乌托邦想象，这皆是对全能自我的虚假认知。若从现实“爱情”的意义来看，这与穆旦自身的爱情经历有必然联系。在近年来的穆旦研究中，学者们对穆旦的爱情诗与情感经历进行考证，如易彬根据穆旦与曾淑昭情感纠葛的相关资料来解读穆旦爱情诗。而穆旦晚年的“爱情”是时光流痕中的一笔繁复色调，深沉的笔法在“理智”与“情感”中得到润色，更显出对“爱情”的言外之意。穆旦晚年对友谊、理想等情愫都给予肯定，唯独对“爱情”未曾赞言，并直指“爱情”的欺骗性。穆旦认为“爱情”具有欺骗性的原因与其晚年的生存境遇和观点转向有关。根据穆旦生平资料整理，在1958-1977年间，穆旦历经政治批斗与抄家，晚年的穆旦不仅要承受复杂多变的政治压力，也要面对生老病死的人生困境。在生活变更中，晚年穆旦历经唐山大地震的生存困苦，也曾因1976年1月的腿伤而卧床不起，昔日好友也相继辞世。在诗歌创作上，穆旦无法获得家人支持，其子女皆未延续其诗歌造诣，加之外部环

43 西渡：《爱的可能与不可能之歌》，选自王家新编选：《新诗“精魂”的追寻：穆旦研究新探》，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第389页。

44 穆旦：《诗八首3》，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77页。

45 李方：《穆旦与现代爱情诗》，《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第14-19页。

境的阻碍，穆旦在去世前亲自焚烧多数诗稿。这样的内、外压力让穆旦对生命感受与现实生活更加明晰，而穆旦晚年诗歌中的“爱情”也具有更加明显的欺骗性。

穆旦笔下“丰富”且“危险”的“爱情”之所以逐渐转变为乌托邦骗局，根本原因是晚年的穆旦拒绝以乌托邦想象逃避生活，若迷恋在乌托邦的理想生活里，则无法直面现实生活。真实的人生是普通人的“普通的生活”，是在“小人物之歌”的岁月中呈现的真实行动，而不是停留在“爱情”的不定性与想象性中。穆旦早年的爱情诗注重的是“肉体性的个人如何在时间中获得稳固的生存根基”⁴⁶，并涉及到个体和社会价值的伦理思考。而与“爱情”联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层面就是“肉体”与“时间”，如何在肉体的衰老与时间的流逝中保持爱情的“生存根基”，这本就是不可评估的话题。由于现实的爱情是恋爱双方的情感牵绊，一方无法主导，永恒而稳定的爱情仅停留在想象之中，这是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差异，因此，真实的生活成为穆旦对抗“智慧”与全能想象的重要方式。如在1976年所作诗歌〈智慧之歌〉中，穆旦直面“智慧”的危机：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诅咒它每一片叶的滋长。⁴⁷

当幻想的迷雾逝去，面对真实的世界，“智慧之树”以“无情”的姿态对情感进行“嘲弄”。“苦汁为营养”是穆旦多年来承受的孤寂岁月，“碧绿”象征着“智慧”的繁盛，而映照出失色的“爱情”：

有一种欢喜是青春的爱情，
那是遥远天边的灿烂的流星，

46 段从学：《穆旦爱情诗论析》，《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1-4页。

47 穆旦：《智慧之歌》，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13页。

有的不知去向，永远消逝了，
有的落在脚前，冰冷而僵硬。⁴⁸

“青春的爱情”可以理解为穆旦早年诗歌中的“丰富的痛苦”，“天边的灿烂的流星”是远离现实生活的“爱情”，这会两个结果，消失与死亡，这也是“青春的爱情”的归宿。晚年的穆旦试图把爱情的本质揭露出来，处于“智慧”与“情感”辨析中的“爱情”上升为一般的哲理，在无常与变动中映射出超越“爱情”的主题，而现实的“爱情”并无法解决永恒的生存矛盾。

此外，穆旦晚年爱情诗中的生命感受与其诗思观点的转变关系密切。在1976年12月9日穆旦写给杜运燮的信中，穆旦写道对曾经喜爱的诗人 Auden（奥登）的看法，提出对奥登诗歌新的理解：

“这类诗也有时过境迁之日，时过境迁人家就不爱看了。”⁴⁹而据资料显示，穆旦晚年曾阅读过陶渊明诗歌，当穆旦谈及对“风花雪月”的理解时，也并非停留在言语表层，而是致力通过语言形式寻求精神共鸣。此种精神是关乎生命的体验，即对永恒生存主题的追问。⁵⁰在抽象意义上对“爱情”的探讨是永恒的，而真实的“爱情”是无法超越空间的限制，却往往被“隐匿”成永恒的存在。人们往往采用自我欺骗的方式陷入“爱情”的乌托邦想象，希望从“他者”获得自我的生命价值，这是将“爱情”作为现实的避风港，从而不敢直面现实，为生命与存在编造欺骗的理由。

晚年的穆旦在〈春〉〈夏〉〈秋〉〈冬〉“四季之歌”中也涉及关于生命与存在的思考，这四首诗歌是穆旦对现实生活的致敬，如穆旦对诗歌〈冬〉的阐释：“越是冬，越看到生命可珍之美”⁵¹，从中可以看出穆旦对生命感受和生命自由的珍视，但“爱情”却可以利用生命感受进行欺骗。如在晚年诗歌〈爱情〉（1976）中，穆旦直接说明“爱情”是“美丽的谎言”：“它雇佣的是些美丽的谎，/ 向头脑去推销它的威力”；“爱情总使用太冷

48 穆旦：《智慧之歌》，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12页。

49 穆旦：《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76页。

50 杨慧莹：《从“新的抒情”到“普通的生活”：穆旦诗歌写作的理念变迁》，《写作》，2022年第2期，第92-101页。

51 穆旦：《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77页。

酷的阴谋，/让狡狴的欲望都向她供奉”；“别看忠诚包围着笑容，/行动的手却悄悄地提取存款。”⁵²如果说《诗八首》传达了理想“爱情”的“丰富”与“痛苦”，那么晚年诗歌中的“爱情”则呈现了生活中的欺骗与荒诞。晚年“爱情”是通过外界证明自我身份，诗歌中的“我”需保持与“你”相似的变动，通过“变形”对“我”进行完善，从而得以证明“我”的存在。通过对“爱情”的追逐，会产生两种结果：其一是将理想的“爱情”融为婚姻的殿堂，理想的完美与现实的残缺相融合，“神性之爱”终将湮灭，“我”的存在被推入“荒原”；其二是对“爱情”不停的追逐，在追逐的过程中，“爱情”与“欲望”相连，自我改变的界限逐渐模糊，是变形或变质已是难以明晰，甚至在不断地前行中迷失“自我”。

当繁茂的“智慧之树”悠然地生长在心灵的“荒原”上，“友谊、理想、爱情”皆被“智慧之树”侵蚀，而“智慧之树”长青，“生命之树”黯然失色。生命价值如果依赖外在的寻求而盛开，就会与“智慧之树”的葱茏假象一样虚无，以“爱情”作为向外探求的方法，证明“我”的生命自由是虚妄的。如果现代人被“妖女的歌”迷惑，或被“爱情”的假象蒙蔽，那么现代人内心也会有一片寂寞的“荒原”留给“爱情”以可乘之机。进一步说，晚年的穆旦不是斥责关于“爱情”的永恒话题，而是忧虑那些生长在心灵“荒原”上被利用的虚假“爱情”。心灵“荒原”和“爱情”一样，最易使人迷失自我，它们可通过变换的方式不被察觉，并通过情感的绿茵进行遮蔽。晚年的穆旦正视“普通的生活”中的真实“爱情”，而非依靠“他者”的“爱情”作为救赎生命的乌托邦，这是穆旦从生命感受出发，对真实生活与虚幻想象的辨认，也是晚年穆旦在年华逝去时，以“爱情”为视角描摹出其一生的缩影。

五、结语：使生命活跃，亦使生命沉淀

穆旦晚年诗歌中最为动人的艺术价值便是从生命感受出发，以生命感受抵抗“智慧”与“荒原”，这是在中国与非中国之外的命

52 穆旦：《爱情》，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52页。

题下进行的考量，不仅是以经验积淀形成的价值体系，更是在感性体验的基础上对生命感受的认知与领悟。

个体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使穆旦诗歌创作始终无法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穆旦是中国的诗人，本土文明对其心智状态的建构是不可或缺的。诗篇不能脱离具体的背景与现实语境而独存，穆旦诗歌也无法游离出汉语语境的规范，但又限于汉语语境的束缚。可以说，传统与西方的养料都是穆旦诗歌伸展的“枝叶”，而培育穆旦诗歌感受方式的“根茎”则是非古典中国的现实土壤。因此，晚年的穆旦面对“智慧之树”的伤害时，试图以诗歌进行内部突破，从生命感受出发，让情感进入“普通的生活”，直面生命的“普通”与“丰富”，尤其是穆旦对于“爱情”的描述，晚年的穆旦直视真实的“爱情”以警醒生命价值。

若以穆旦晚年诗歌研究延伸至二十世纪的中国诗歌发展，那么在中国诗歌探讨中，对于本土与西方，历史与现实，古与今，新与旧的探索从未停止。然而在“破”与“立”的反复穿梭中，如何将诗意本身的价值体现出来；如何深入表里地探索时代的症结；如何将知识分子的激动与感伤融入诗心的伤逝；如何随着历史与时代的变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生命的栖息之所。这些探索可以引领研究者从生命感受的视角去探索尘封的历史，通过生命感受，使生命成为动词，使生命活跃，亦使生命沉淀。

参考文献

1. 穆旦：《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2. 穆旦：《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3. 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选自《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4. 陈大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昆明大阵观——西南联大诗歌群落的崛起与陨落》，《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2020年第2期。
5. 戴惠：《诗情不因苦难而改变——论穆旦晚年诗歌创作的品格》，《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6. 高秀芹、徐立钱：《穆旦 苦难与忧思铸就的诗魂》，北京：文津出版社，2007年。
7. 黄玲：《寒冷·通透·忧伤——穆旦晚年（1975-1976）诗歌的一种读

- 解》，《名作欣赏》，2009年第12期。
8. 李怡：《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9. 李章斌：《重审穆旦诗中“我”的现代性与永恒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3期。
 10. 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学丛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1. 孙玉石：《走近一个永远走不尽的世界——关于穆旦诗现代性的一些思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2. 王光明：《“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3. 王家新：《“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重读诗人穆旦》，选自王家新编选：《新诗“精魂”的追寻：穆旦研究新探》，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
 14.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附录.》，收录于《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15. 西渡：《爱的可能与不可能之歌》，选自王家新编选：《新诗“精魂”的追寻：穆旦研究新探》，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
 16. 夏小雨：《普通的生活 失败的诗歌 论穆旦晚年诗》，《上海文化》，2013年第1期。
 17. 易彬：《悲观的终结——一种对诗人穆旦晚年的理解》，《书屋》，2002年第3期。
 18. 易彬：《个人写作、时代语境与编者意愿——汇校视域下的穆旦晚年诗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3期。
 19. 易彬：《论穆旦诗歌艺术精神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0. 杨慧莹：《从“新的抒情”到“普通的生活”：穆旦诗歌写作的理念变迁》，《写作》，2022年第2期，第92-101页。
 21. 张桃洲：《穆旦研究的集成之作——读〈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1期。
 22. 张岩：《荒原意象与西方文学的精神流变观》，《同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23. 朱光潜：《谈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4. （德）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海德格尔文集：林中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25. （英）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著，汤永宽、裘小龙译：《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